

论“干校文化”^{*}

陈 辽

(江苏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 江苏 南京 210012)

摘 要: 对“干校文化”兴起的由来、内容作了历史的回顾与理论的阐述, 重点分析了干校学员五种文化心态, 最后从国民性的负面上探求了“五七干校”何以能存的原因, 较系统地回答了“干校文化”研究中存在的诸多理论问题。

关键词: 干校文化; 文化心态; 国民性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人一起,轮流看守菜地。她自己讲述了去干校途中的情形:“我们在武昌把所有的冬衣、雨衣、大衣都套起穿在身上,背着简单的行李,在泥泞的路上,从武昌走到咸宁,当我们累得要死的时候,作协来接我们的同志,却都笑着称我们为‘无耻(齿)之人’,这又把我们的逗笑了。”寥寥九十多字就写出了未到干校之前冰心等人所受到的折磨。到了干校,冰心始终采取静观人世的态度。持这种文化心态的也不在少数(参见《一片冰心在向阳——拜望“文坛祖母”谢冰心》和冰心《和郭小川一起到咸宁》两文)。

其四,“身在向阳湖,心系周总理。”持这一文化心态的可以周巍峙为代表。周巍峙是著名的音乐家。《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歌曲的作者,“文革”前在文化部即是司局级干部(“文革”后任文化部代部长)。他在咸宁“五七干校”里也备受迫害。不能说周老在干校里已经觉悟很高,他把希望寄托在有朝一日政策落实到自己身上,特别是“心系周总理”,希望周总理真正有职有权,贯彻执行党的政策。他“心系周总理”是对的,但在“文革”年代里指望周总理落实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政策,又是不切实际的。事实上,只有粉碎了“四人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党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政策,才得到全面落实。其后,周巍峙已经认清了干校的本质。当李城外访问他,请他谈咸宁干校那一段生活时,他发问道:“你们现在挖掘向阳湖文化资源,出发点是什么?是宣传向阳湖,还是揭露‘四人帮’?”李城外回答:“为的是‘铭记历史,弘扬文化’,在宣传文化人的同时,警醒大家吸取文革惨痛教训,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周老才表示首肯,谈开了往事。(见《春风曾度向阳湖——访原文化部代部长周巍峙》)类似周巍峙文化心态的同志也不少。他们在干校认真劳动,认真检讨,“心系周总理”,等待党的政策在自己身上落实。

其五,也有极少数一部分同志,他们在干校“解放”较早,干的劳动较轻微,离开了政治气氛压抑、沉闷、缺少安全感的北京,来到咸宁,顿觉天地开阔,因此对干校生活颇为习惯,在向阳湖写了不少诗篇。这可以臧克家为代表。臧老在民主革命中和“文革”前十七年写过不少优秀诗作,也没有什么历史问题,又不是当权派,所以较早就“解放”了。在干校里,他基本上是干些看菜地的轻活,所以他在返京后写下的“忆向阳”诗篇,田园诗的风味十足,和干校实际上的严酷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就臧老本人而言,他的感情是真实的,但就揭示干校的实质来说,他这些诗是反真实的,干校怎么可

能是诗中所描写的那么美好的田园呢?不过,不管怎么说,臧老的文化心态对某些问题不大,劳动负担不重的干校学员来说也是有代表性的。臧老的夫人郑曼同志对《忆向阳》这本诗集作了解释:“当时我们的觉悟程度没有那么多高,并没有觉得干校是极左。只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抱着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观的态度下去”;“所以这些诗并不是作出来的,确实是从心底流出来的。”(《九十依然忆向阳——老诗翁臧克家访问记》)因此,这种文化心态的产生也是可以理解的。

正因为干校里的成员,具有如上不同的文化心态,持前两种文化心态的都是少数,而大多数持的是从不觉悟到觉悟的过渡型文化心态,所以干校才办得下去。若不是林彪摔死,“五七”干校很可能要办到“四人帮”垮台才会结束。这就引申出这样一个大问题:为什么“五七”干校能在中国出现,并持续有数年之久,这在我国的国民性方面是否也有值得深入反思的问题。

三、从国民性的负面上探求“五七干校”何以能够存在的原因

“五七干校”以至“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在中国办起来、发动得起来,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小农经济的广泛存在;农民意识的深入人心;专制主义的传统长达两三千年。这些,不光是这些,是“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在中国能够发动起来的根本原因。在欧美现代国家,不可能出现“文化大革命”。即使在苏联,斯大林可以搞“肃反扩大化”,但也搞不起来“文化大革命”。因为在苏联,还有一定的党内民主。在布尔什维克多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上,列宁的发言常被反对声打断,有人大叫:“我不同意!”而这种情况,在中国的党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上是不曾有过的。至于“五七干校”之所以能在中国办起来,而且只能在中国办起来,除了“文化大革命”这个大环境的外部原因外,还可以而且必须在国民性的负面上找深层原因。

所谓“国民性”,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国民在几千年的文化积累中逐渐形成的独特的国民性格。一国的国民性,既有正面、光明面,也有负面、阴暗面。鲁迅研究中国的国民性,而且为改造国民性的负面,在创作中的杂文里进行了毕生的斗争。鲁迅认为,在中国的国民性中,正面、光明面是主要的。他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写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埋头苦干”、“拼命硬干”、

我就斗你这个“走资派”；今天我今天还是革命路线的
执行者，我就参加揪你这个“五一六”。所以斗争会上口号声一片，斗“走资派”时一个个上台发言